

※「傅柯未刊稿及其研究」專輯※

裝備將是集體與否？

布洛薩* 著 莊浚生** 譯

一、回溯「三位一體」下的集體研究現場¹

由霍給 (François Fourquet) 與梅哈 (Lion Murard) 所撰寫的第十三期《研究》期刊 (*Recherches*) 的導言裏，把該期的主題訂為開啟一系列以「資本的系譜學」 (*Généalogie du capital*) 為題的研究。其中的一項「細節」使人眼前一亮：該導言相對簡短的五節文字裏，出現五次以傅柯 (Michel Foucault)、德勒茲 (Gilles Deleuze)、瓜達里 (Félix Guattari) 為一「系列」 (*série*) 的用法。這種用法彷彿是：當霍給與梅哈還是年輕學者時，為了給剛開始的該期期刊與雄心萬丈的研究一個精神支撐，而把傅柯、德勒茲、瓜達里三人當作三位一體來成為知識上的庇護。這種「系列」幾乎接近於拉克勞 (Ernesto Laclau) 所認為「等值鏈」² (*chaîne d'équivalence*) 的意義。

他們明白地強調，「我們已經邀請傅柯與德勒茲（瓜達里早先已經參加）參與我們的主題討論，這一主題在各方面都與他們的主題有交集，儘管方式完全不同」或者「毫不意外地，德勒茲、瓜達里、傅柯早就在我們研究小組的不同系列中出

原文 “Les équipements seront collectifs ou ne seront pas” 為布洛薩於「傅柯在巴黎第八大學」 (Foucault à Paris 8) 研究會的發言內容，其後刊登於 <https://ici-et-ailleurs.org/contributions/portraits-philosophiques/article/les-equipements-seront> 網站上。

* 布洛薩 (Alain Brossat)，法國巴黎第八大學哲學系名譽教授。現為國立交通大學文化研究國際中心約聘研究員、教育部「玉山學者」特聘教授。

** 莊浚生，法國里昂第三大學哲學系博士生。

¹ 本文的標題為譯者所加，以方便理解該文的陳述脈絡。

² 譯註：「等值鏈」是指：在不同利益的相近或敵對的團體之間，基於同盟策略且有利於結合勢力，在社會上發表有影響力的意見，而建立一個政治立場一致的統治霸權。

現。我們可以大膽地說，無論他們是否同意或知情，他們早已是以我們知識航道上的想像伙伴的這種身分，頻繁地在本小組出席了」。甚至，在文章末端的道謝詞裏，以帶著略為莊重的語詞提及他們的全名：「在某些要點上，吉爾·德勒茲、米榭·傅柯與菲利克斯·瓜達里非常樂意地參與我們的討論，雖然他們還置身在整件事情之外（菲利克斯除外）。」

如果我遣詞用字有所不妥，請大家見諒。我認為霍給和梅哈把他們的研究結果建立在該神聖的三位一體之下，有點像在同一個年代的脈絡下，革命組織的運動分子在其文章裏尖銳地呼喊「馬克思、列寧、托洛斯基」，或是「馬克思、列寧、史達林、毛澤東」等，將其行動付託於令人尊敬的名字之下。這種做法有點像是用「哲學的理想人物」(idéal philosopant) 來取代「運動的理想人物」(idéal militant) 這一可疑的用詞，以此更貼切地保證研究計畫處於正確軌的道上……這其實只是欲望投射 (investissement libidinal) 的位移而已。

但先把這件事情放在一邊，更為有趣的是：若把重點放在這三人的庇護上，將會帶來輕微的混淆，阻礙我們對事情後續印象的掌握，影響我們對該文章的定位與情境的基本場景：德勒茲—瓜達里，在兩人名字之間加上連字號，是大家熟悉的事情，兩人合著的《反伊底帕斯》(*L'Anti-Oedipe*) 出版於一九七二年，然而期刊《研究》則發表於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但為何是「傅柯／德勒茲／瓜達里」？霍給與梅哈在此只想強調一個簡單的事實：傅柯與德勒茲作為「外部」的擔保人，而瓜達里則作為「內部」群組的召集人，為該研究計畫取得資金的來源——我先跳過其中的細節。在發布傅柯的文章〈集體裝備的浮現——研究進度狀態〉的網頁（“*Ici et Ailleurs, pour une philosophie nomade*”），我們可由謝瓦列 (Philippe Chevallier) 所撰寫的完整介紹中讀到內容細節³。

但是，在一連串幾乎是德勒茲—瓜達里式語詞的主張裏，某些東西需要特別注意：這「一切」(tout ça) 都是集體力量 (puissance collective) 的主張，一部展現出各種特定方向的思維機器——作者們提及傅柯對監獄、禁閉與正義的研究；德勒茲對尼采的研究，以及德勒茲與瓜達里共同研究下所完成的《反伊底帕斯》。但霍給和梅哈將此定義為一種共同的基礎，如同以下的描述：「傅柯、德勒茲、瓜達里：在

³ 譯註：參見 <https://ici-et-ailleurs.org/contributions/politique-et-subjectivation/article/emergence-des-equipements>。

巴代耶 (Bataille) 與柯羅索斯基 (Klossovski) 所更新的尼采式斷裂的基礎上，藉由傅柯與德勒茲，大規模地展現出欲望與權力之間共同領域。」而且，名字的引用更加重了標籤化的效果：「因為基於如此，該理論的出現才能夠大幅度地供給我們寫作團隊灼熱的想像。」因此，「唯一一次的出現」(Une seule presence) 卻是三重性的……。

二、學術裝備與分工治理的限制

我所強調的是，從霍給和梅哈的文章所流露出的證據，對照於其他證據，亦即，分流接納邏輯 (logiques de la réception) 強加給我們的一種證據。我會說，那幾乎就是科學家的、專家的、大學學術上的分流接納的治理 (police de la réception)：長時間以來一邊是德勒茲—瓜達里的派系，而另外一邊則是傅柯的派系，藉由不同的習性呈現出各自區分的形象。我不用再說細節，相信在座的各位已經聽過不同的傳聞。我可以充分地說，「傅柯」與「德勒茲—瓜達里」的論述中心隸屬於各自專屬與正當的接受者。用傅柯的話來說，我們不可能隨意地走進傅柯的部落，像走進磨坊那麼隨意；同樣情況下，如果沒有出示通行證，人們不能從某一個部落的領土遊走到另一個部落的領土。

實質上，標籤與規定一直都存在，儘管未曾公開，卻仍被嚴格地執行。簡言之，我們不太可能在 *Chimères* 期刊下找到格霍 (Frédéric Gros) 的文章⁴；相反地，在傅柯的會議裏的隱形人（精確地說，女人）是安·格埃里安 (Anne Querrien)。我之所以提及她的名字，是因為她當時為青年研究者圈子中的一分子，我所評論霍給與梅哈的文章，正是以此研究圈為名而寫作。該文章末列舉出合作撰稿人的名單：夏特萊 (Gilles Châtelet)、迪斯蒲 (Laurent Dispot)、法布爾 (Alain Fabre)、霍給 (François Fourquet)、吉爾梅 (Philippe Guillemet)、利維耶 (Françoise Lévy)、梅哈 (Lion Murard)、格埃里安 (Anne Querrien)、施蒙尼 (Alain Siboni)、韋爾—史達佐茲 (Marie-Thérèse Vernet-Stragiotti)……必須注意的是，以上所列出的知識分子飄零四

⁴ 譯註：*Chimères-Revue des schizoanalyses* 為專門以分裂分析的角度研究人文科學不同議題的期刊，於 1987 年由德勒茲和瓜達里創立；而格霍則是傅柯思想研究的專家。布洛薩引用該例子，表達出在當代法國思想界裏，傅柯與德勒茲—瓜達里之間具有明顯區隔的形象。

散，沒有一個名字曾在如今專業研究傅柯的學術圈裏出現過。

不過，不要把我這些言論想像為一種惡意或者有諷刺的意思。我只是簡單地採納了一直以來存在於哲學學術建制內，將作者嚴格地分流接納以便治理的分析觀點。只有事情過程被翻轉，或者建立一種體面的論述以整合各自不同的軌道，否則，以配置與專業分工的思維表達出「德勒茲—傅柯學派」(deleuzo-foucauldien)的僵硬特徵，在此角度來說，只是一種模糊、折衷、難以表述的形象。相反地，如果你們所通過的考驗是從那些或多或少具有艱深的學術手稿與課程，或者是從那些昔日為傅柯狂熱者，而如今成為傅柯專家的課程記載而來，那麼也許你們遲早會被學術建制所裝備。

但顯然有點難過的是，學術上的「治理」(無論是「傅柯學派」或者「德勒茲學派」)並沒有使我們避免了其他問題。相反地，當更進一步思考時，有一件事情令人更為遺憾：如果你們更仔細觀察該事情，在規訓層面上，你們會看到分流接納的邏輯最終把上世紀末的法國哲學三大巨頭推向那些最不幸的形態。以我的觀點看，傅柯的例子是聖吉洛姆路 (rue Saint-Guillaume) 上的高等政治學院，而德勒茲—瓜達里的例子則是在精神分析的診間或醫生診間，我提這幾個名字，只是為了預防萬一你們沒有立刻想到而已。當然這一切並非分流接納邏輯之一切，它只是分流接納的「末期」，是指醫學意義上的末期階段。哈利路亞！

三、集體研究現場的另類想像

用別的話來說，分流接納邏輯嘗試復辟作者權的君主政體（作者們彷彿是君主）：將作者們固定在話語與概念的獨特性裏，並且將他們各自指派在異質區域裏。在此區域內，分流接納就是一塊領土，不同的實踐運作在這塊領土上展現，成為特定規訓的對象，服從於編碼與特定的習俗，包括語言上的約定俗成與「關鍵詞」之類。相反地，當我們重新回到這篇被遺忘又重新被發現的傅柯文章裏，謝瓦列的文章恰如其分地指出了一點，「形構」(configuration)⁵是描繪關係優先於個體的

⁵ 譯註：「形構」該詞引用於德國社會學家伊里亞思 (Nobert Elias, 1897-1990) 的社會學基本概念 Figurationssoziologie。提出該概念是為了解決社會學理論中，個人行動者與社會結構之間的根本差異與緊張關係。在伊里亞思所描述的社會發展過程中，人類文明以社會群體為基本單位，然後再從該整體結構把個人放置於社會的不同座標上，「結構」(structure) 是對人類文明的量性觀察，

優越性 (prééminence du relationnel sur l'individual)；或者可以說，比較傾向於西蒙棟 (Simondon) 裏，某事物的「跨通性」(trans-) 以及其效果的意思。自然而然地，安居在德勒茲、瓜達里、傅柯所創立生態區位 (niche écologique) 的青年學者，會認為這三位人物比較像是落實他們研究工作的集體配置運轉 (agencement collectif)，我所指的並不是「庇護者」的集合體 (agrégat de protecteurs)，而是創造出集體研究條件的交互作用系統 (système d'interactions)，以建立研究計畫的發展。

集體配置運轉具有雙重狀態：「交換」(échanges)（尤其記錄在傅柯《言與文》中所收集的文章）以及在他們還活躍時 (in vivo)、在他們構思制訂之時的「概念流通」(circulation des concepts)。在傅柯文章裏所產生的「形構」，對於既非學生，亦非專家（像是思想專家或者像是他們的「監護人」的專家）的青年學者而言，問題所著重的並不是他們到底是「傅柯學派」、「德勒茲學派」或者「德勒茲—瓜達里學派」，而是他們只是恰好在該處境下 (en situation)，而且在該稀有的時刻裏開創了一個交流與討論的空間。在那之中，各自正在進行的研究得以直接相匯合：一種充滿著意外的「流動」狀態 (condition de fluidité) 簡單地證明了所發生的事情。我們看到傅柯在文章裏的關鍵字是一個不太屬於他的慣用語——「裝備」(équipement)，而不是「部署」(dispositif) 或者「機器」(appareil)。這說明了在一個研究工作的「形構」裏，概念本身能夠交換與流通，而分流接納的邏輯在支配世界背後的規定中，必然以折衷主義 (l'eclectisme) 之名遭到譴責。

有趣的地方在於，在該情況下，這事情激發我們在不同的思想體系下反思我們與啟發我們的學者之間的關係。

現在我想回到在哲學層面上進行討論。該層面讓我必須更加注意到此主題具有一個讓我們難以聚焦的傾向，當該文章在傅柯的觀點下以「集體裝備」的浮現作為命名；而在《研究》的觀點裏——「資本的系譜學（卷1）：權力裝備——城市、領土與集體裝備」則分解為幾個問題，因而「集體裝備」成為研究的第二部分，但它同時是「集體裝備的系譜學」的問題。如果我們清楚地理解，集體裝備是權力裝備的一部分，然而在系譜學與浮現 (émergence) 的語詞使用之間，顯現出帶有輕微猶豫的態度；尤其是當我們熟悉傅柯在考慮系譜學的詞語使用時，該猶豫的態度必然

而非基於人類真實互動的質性描述。「形構」的概念改變了社會學的語詞，強調了個人行為在社會的相互滲透之動態。

具有其重要性。

無論集體研究進行的多麼活躍，眼前當下的語詞差異確認了一件事情——事物並不是全然地以專業詞彙、固定裝置（無論是記載或占據）、概念方式被規定。我們必須說，令人矚目的是，根據文本內的微觀挪動 (micro-déplacement)，裝備的概念在傅柯、德勒茲、瓜達里與 CERFI 的青年學者「之間」被確立下來。裝備的概念通過思想板塊之間的流動與連續碰撞，同時這一概念在集體研究的發展過程中，發揮著相互膠著的作用。在思想相遇之間，其概念的靈活使用並沒有產生任何「克分子的壓縮同質性」(homogénéité compacte du molaire)⁶，反而是自由流通的情況達到某程度時，將會在此機遇中形成思想體系的混種 (hybridation des systèmes de pensée)。

事實上，傅柯在該文章的確建立了「屬於傅柯」(du Foucault) 的形象，謝瓦列注意到該文章與《監視與懲罰》(*Surveiller et punir*) 具有很大程度的相似性，但傅柯撰寫該文比較像是一種基本材料，以及將之視為刺激他當時研究的一種可行性。但對於青年學者而言，其「問題」則有所不同：所有行動場域種類中的欲望投射（包括從政治運動到診所）、在權力關係裏的欲望強度與權力的情愛（詳見第十三期《研究》的介紹），我並不認為這些主題有異於傅柯的思想，或者離他很遠。或許在這種情況下，《知識的意志》(*La Volonté de savoir*) 的主題比《監視與懲罰》更為接近……。

因此，使我矚目的是，在此格局中有一種姿態方式，讓一切向不同方向流通，自由地灌概，先於操縱與思維標籤的龐大裝置介入……，在該「形構」裏，重要的不是概念的嚴謹或準確，重要的反而是，概念能負載多少關聯性的能耐，概念的使命是加強流通、是創造出一個空間以容許討論與集體創制。

⁶ 譯註：該語詞顯然地屬於德勒茲—瓜達里的專屬用語。該用語運用在「微觀政治」與「分裂分析」的論述裏，「克分子」(molaire) 的概念扮演著一組分割線 (segmentarité) 的一方。而在該組的分割線裏，「克分子」是相對立於「分子」(moléculaire)，分別代表著「階級」(classes) 與「群眾」(masses) 的社會政治結構。在微觀政治的分析觀點裏，分子化的群眾是無法被化約為克分子的階級，如同在《千重臺》所說：「階級在群眾中被裁切成形，也使得群眾得以結晶聚合。群眾仍然不斷地流動與溢出於階級之外。」(*Mille Plateaux* [Paris: Minuit, 1980], p. 260) 布洛薩在此引出集體研究裏的一種微觀政治，其集體配置的運動並不受限於傅柯、德勒茲、瓜達里與一眾青年學者之間的階級與思想分野（亦即分流接納邏輯的預設）。反而在思想的集體裝備裏，每位參與者就像群眾的分子一般，在偶然之間一致地達到交換與概念流通的微觀運動。

四、集體裝備的建立能否達到規訓治理的效果？

到目前為止，我所說的有點反潮流，但想強調一點：傅柯在文章所提及十七、十八世紀裏的集體裝備與其浮現的研究方式，完全可以在該研究狀況下被更新，因此他才能從規訓的形成引出個人與集體治理的模式。該語調不斷地表明體制的發明（例如：軍隊、醫院、學校）與規訓部署的建立之間具有直接與大規模的關係。

當然，我們不能把其關係的推論視為目的論 (*finaliste*)。這些體制被發明或運作並不是「為了」規訓能夠建立，傅柯只是強調出在兩者之間存在著不可分離的連結。舉他在文章中提到的一些較為明顯的例子，「人們」不是教導某些更重要的人閱讀與書寫，以著眼於使得更細緻的權力行使在這些人身上，細緻程度直到「其存在的毫芒」；而是指出一些事實，亦即，一切（包含權力）只是如此地發生、如此地運作 (*fonctionne*) 而已。重要的是，學習閱讀與書寫的功能性在於，可以使得對生物的治理趨於完善。因此，用傅柯自己的用語來說，此種連結產生的方式如下：「教導書寫，同時被書寫所厚植能力。建造學校使個人主體可以掌握實踐，又使用實踐來組織諸種服從系統。」重點所強調的是客觀的連接，而非為了結果而展開的手段，該推論是功能論 (*fonctionnaliste*)，而非目的論。傅柯並不是亞里斯多德主義者，尤其是在使用意識型態的觀念時，與他那時代具支配力的某些馬克思主義者恰好相反。

對於以上的論述所言，我並不確定透過規訓的角度，是否可以使集體裝備的研究進路深入問題的論述。我想避免在處理古謝 (Marcel Gauchet) 或更糟的賀諾 (Alain Renaut) 時，激起你們強烈的情緒，但是我不確定我們是否能夠一致地、無區別地把集體裝備視為進入規訓的門檻，與將體制反覆灌輸在個人與集體上的理由。首先，並非所有規訓都是明顯類似的，且能夠將它們放在同一個分析體制內。再者，它們之所以如此的「同質化」 (*homogène*)，這是在六八學運後的氛圍之下所烘托，以及流行於七十年代前半葉所使用的話語習慣下所找到的觀點。我認為，當我們採用系譜學方式以及將某些現象回溯到規訓浮現的場景時、當我們在研究規訓來源 (*provenance, Herkunft*) 的某些關鍵時刻時、當我們檢視規訓的時間與發展的路線而該證據卻陷入不同程度的混淆時，那只能說這種情況是藉由「裝備」而獲得「裝備」 (*équipement par équipement*)……。

恰好對應農希 (Jean-Luc Nancy) 所說，在多數的西方民主政體裏，軍隊作為規訓體制的發源地，卻被認為「無所用」(*désœuvrée*)，以及體制經常各自按著自身獨特與差異的形態穩定地進行規訓運作。如同在一般脈絡裏，德勒茲與瓜達里曾經宣稱，當代生物治理的裝置 (*appareillage du gouvernement des vivants contemporains*) 更加轉向為控制與監視，多於嚴格意義下的規訓操作。又例如：在幼兒園或某些醫學運用的其他範圍裏，「豁免、免疫」的典範 (*paradigmes immunitaires*) 明顯地優先於規訓形式。

但是我特別想說，在西方，以現代社會規訓機制的角度研究集體裝備，並非常見，此進路明確地阻止其他維度或者理論的挑戰。我認為，該研究應建立在集體裝備與使集體生命持續的物質基礎之間的關係上，而且，緊接著，這關係建立在這些裝備的性質與某種層次的人權之間。

由生命政治 (*biopolitique*) 與生物治理 (*gouvernement des vivants*) 的範圍所概括的集體裝備研究進路，對我而言，它們扼要地相互執行著兩種不可分離的作用：第一，是保障生活方式，以語義重覆的方式在裝備個人與集體的生命同時，亦確保了不可或缺的生活基礎，例如：治療、教育和懲罰等；第二，是以生物治理方式達到規訓個人的控制效果，規訓的動機在此應該以廣義的方式被理解，例如：一套整體的方法與策略，使得生物可被治理。

我認為，以這篇被找出的文章所論述的時代特徵而言，它只片面地強調出上述第二點。如果我們重寫該文章，重新審視現有的論述，以制訂出「集體傅柯」(*Foucault collectif*) 的角色，且把我們放在當今條件下，而不同於七十年代前半葉的話，對我而言，我們必須嚴肅地挪移一步開來。我認為，「集體裝備」這個主題當今處於一種緊張氣氛中，我們必須盡早開始描述現況。一方面是，以我們緬懷的同事狄奧特 (Jean-Louis Déotte) 的用語來說，我們總是被配置 (*appareillés*) 於那些被轉譯的事實，即透過義肢 (*prothèses*) 所雙重化與延伸出的某類裝備，這通常反映在我們溝通裝置 (*appareillage communicationnel*) 的特徵上。但在另外一方面，如果我們試圖持著傅柯的裝備的研究進路，超越於由網路所促使的溝通革命，令人煥然一新的是，我們已經進入由新自由主義典範力量所引起的集體裝備退化的時代，尤其在醫院體系裏的公共醫療的危機，以及基於教學人員編制縮減，而使教育品質退化等。我們可以在不同報導中充分地找到關於集體裝備衰退日益嚴重的新聞，其導致的結果是：一般大眾所反感的並不是規訓的影響，反而是規訓的逃避責任、機能不

良與嚴重違規行為——尤其我想到的是正義。

在集體裝備的文末裏，有一段傅柯談論「任何的個人性」(*individualité quelconque*)的段落：「任何的個人性，無論是低微的與一般眾人的，皆達不到被描述的門檻。被觀看、被觀察、被細節刻劃、被不間斷的書寫日積月累地追蹤，這些都曾經是一種特權。人的編年史、其生命故事與順著他的存在軸線所編寫的歷史文獻，這些都是他的權力儀式的一部分。」

但如果大家最近以「黃背心」(*gilets jaunes*)該類運動的角度考慮「任何的個人性」，看起來問題的根本層面（排除塞吉埃大法官時代的稅制問題）⁷將是一群失落的普通民眾，尤其是那些生活於遠離都市的人，面對著集體裝備的退化：醫療沙漠、學校關閉與缺乏既有的公共服務等問題。

因此，我們可以說，在傅柯所採用的面向與生物治理在其規訓形態裏運作著此類的「持續失調」(*excès perpétuel*)之間，一種決定性的位移由此產生：該失調被視為個人與集體不斷地提供不服從的養分⁸。

但另外一方面，如果我們談論服從——「精緻與詳細的控制機制，使得對個人的一種知識得以形成與累積」與「更細緻的權力行使在這些人身上，細緻程度直到其存在的毫芒」，那麼必須承認，傅柯從來沒有經歷過智慧手機、社交媒體、監聽技術、美國太空總署等的時代。我們現存的裝置中，由權力的電子裝備所掌握的程度，比傅柯所想像的還要更進步。但是，該強化的裝置不再是規訓的，而是隱形於控制與監視的特徵之下。這不僅是抗爭的前線與抵抗的陣地，就如同傅柯所見的種種規訓，甚至於拉響警報、吹哨的人物也出現，例如：斯諾登 (Snowden) 或亞桑傑 (Assange)，以及來自於繼承傅柯的知識分子……。

概括而言，現況的弔詭處在於，作為傅柯的好徒弟們，我們似乎必須對抗遍布於各地的醫療失調，但當醫療沙漠擴張到某些特定地區而不是其他地區時，我們同時又必須清楚辨認出，在這種擴張中有讓人無法忍受之處。

⁷ 參見 Michel Foucault, *Théories et institutions pénales. Cours au Collège de France. 1971-1972* (Paris: EHESS, Gallimard, Seuil, 2015)。

⁸ 譯註：在傅柯的觀點裏，體制在建設集體裝備的功用在於：為人提供生活基礎條件的同時，亦獲得規訓治理的回報。而布洛薩教授所觀察的是，當集體裝備的品質無法為生活得到基本的人權保障，卻依舊以退化失能的裝備作為規訓的手段時，兩者之間隨即失去平衡，規訓治理的失調衍生出個人與集體不服從的誘因。

總結而言，集體裝備的某些面向構成傅柯分析的盲點：此面向即是基本權利與裝備品質的連結，亦即，在我們的社會裏，集體裝備清楚地被建立在集體裝備的品質「與」我所說的宜居生活的基本權利、法律人權之間的關係裏，例如公共廁所。你們可能覺得有點瑣碎，但我的意思並不是全然如此。該集體生活的裝備難以用規訓的角度被分析：統治者藉由生物規訓作用及同樣的控制與監視，以獲得誘因的利益並不顯明。相反地，容易被驗證的是，來自於東亞國家像日本、臺灣、新加坡和香港的一般遊客到法國或其他歐洲國家觀光時，他們都難以忍受於這些稀少與機能不全的裝備。我認為他們在此處所看到的，正好是裝備基本權利的崩壞。在該情況下，基本權利是滿足一種自然的需求……。

不過，最後他們的失望似乎讓傅柯有理由說：因為公共廁所看起來構成了一種屬於國家的集體裝備，但統治者並不能夠在實際上從中獲得任何規訓、加諸對生物治理的秩序、控制與監視的好處（很難在廁所裝置監視器），裝備的主要範圍還是關於「生活的品質」，亦即，使一般民眾有舒適的生活；因此像我們這種緯度的地區，政府幾乎不關心該事情……。

沒有廁所的法國捷運對比於每個車站都有廁所且基本上乾淨、齊全、免費的臺北與東京捷運，兩者之間形成嚴重的反差。因此，國家與行政文化的問題，涉及於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以及「治理」品質與政府機構之間的關係。國家對該類型的裝備缺乏諮詢公眾（或被統治者）的興趣，並表達了明確的訊息：繳出你們的稅款和罰金，不抱怨地接受瓦斯、電力與汽油的價格上升——至於其他的事情，請你離開，這不是我們的問題！

在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關係中，必須學會清楚地辨認統治者所隱瞞的錯誤，這是理解現今狀況最有用的利器——魔鬼往往藏在最瑣碎的細節裏……。